

# 德 性 与 死 亡

## ——论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

谢裕安

[摘 要]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道德建立在理性知识基础上的西方思想家。他为“德性即知识”的道德原则而不懈努力并为之受难。他的死亡成为一次意味无穷的哲学事件。苏格拉底通过自己的悲剧使理性成了西方人生活的普遍原则。

[关键词] 德性;知识;理性;死亡

[作者简介] 谢裕安,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伦理学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3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08)03-0028-04

“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并将它引入家庭之中,促使它研究生活、伦理、善和恶。”<sup>[1](P464)</sup> 苏格拉底明确肯定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这就在古代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中首次建立起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赋予道德价值以客观性、确定性和普遍性。

—

苏格拉底生活在智者的时代,他认为智者们的相对主义感觉论只能助长个人利己主义和个人享乐主义,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思想根源。因此,他强调知识,贬低感觉,要以理性去探讨伦理观念和道德价值,确定普遍的绝对的善;他把道德和知识统一起来,要求人们“认识自己”、“真正的我”即心灵或理智。只有灵魂或理智才能使人明辨是非,明辨什么是“善”和“恶”,才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他的基本命题是“德性即知识”。

“正义和其他德性都是智慧。”希腊词语“arête”(德性)不仅指人的优秀品质,也指任何事物的优点、长处和美好的个性。苏格拉底把人在生活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所有优秀善良的品质,如正义、自制、智慧、勇敢、友爱、虔敬等等都称为 arête,一般将其译为“德性”(virtue)。这些都是高尚的、善的,体现了人的道德本性。“德性即知识”这一命题确定了苏格拉底的全部道德对话活动,他同人讨论种种美德的定义,经过反复辩驳,最终都归结到这个命题上。当美诺询问苏格拉底“美德是否可

教”时,他回答说“如果连什么美德都不知道,又如何能够知道它的性质呢?”<sup>[2](P492)</sup> 当美诺列举了各种具体的美德时,苏格拉底说,“尽管美德多种多样,但它们至少全都有某种共同的性质而使它们成为美德的。任何想要回答什么是美德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记住这一点。”<sup>[2](P493)</sup> 苏格拉底指出,如果美德是心灵的一种秩序,并且人们都认为是有益的,那么它一定是智慧,因为一切心灵的性质凭其自身既不是有益的也不是有害的,但若有智慧或愚蠢出现,它们就成为有益的或有害的了。

“德性是可教的。”“德性即知识”中的“知识”主要是指要能认识人自己的本性(physis)<sup>[1](P435)</sup>,既然德性的共同本质是知识,人的理智本性贯通在道德本性之中,德性就有整体性和可教性。苏格拉底认为,道德人格内部不存在分裂,它是由理性构成的内在和谐的整体。有了知识,便有了德性;没有知识,便没有德性。知识的可教性蕴涵着德性的可教性。“如果像普罗太戈拉想要证明的那样,美德是知识以外的东西,那么显然它是不可教的。”<sup>[2](P488)</sup>

“无人愿意作恶。”苏格拉底认为,由于对理性的普遍知识原则的确认,没有人从认识上就自愿去作恶。那些看起来似乎在期望邪恶的人,实际上必定“不知道”他所期望的就是恶;那些公然谴责正义的人,如果不是在说谎,就是根本不知道正义的含义。“无人会选择恶或想要成为恶人。想要做那些他相信是恶的事情,而不是去做那些他相信是善的事情,这似乎是违反人的本性的,在面临两种恶的选择时,没有人会在可以选择较小的恶时去选

择较大的恶。<sup>[2](P484)</sup>

## 二

“德性即知识”强调的是,只有知识和德性的相互统一,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作为哲学家的理想人格,苏格拉底始终不渝地贯彻着自己的哲学原则。他表明:“只要我还有生命和能力,我将永不停止实践哲学,对你们进行规劝,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sup>[2](P18)</sup>他穷其一生在雅典的十字街头思考和讨论着“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等高贵的问题,并为实行正义而谴责不义。在他看来,离开正义,智慧就会蜕变为游戏,勇敢就会演变为莽撞,节制就会异化为限制和统治。苏格拉底把自己比喻为“马虻”,“神特意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它就好像一匹良种马,由于身形巨大而动作迟缓,需要某些蚊子的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在我看来,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就是让我起一只蚊子的作用,我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你们中的每一个人。”<sup>[2](P19)</sup>他把对祖国哲学式的爱表现为对祖国进行深刻的道德批判。但他的祖国却用死刑酬劳了他的忠诚和哲学贡献。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以信仰新神和败坏青年两个罪名,判处他死刑,这是雅典制度的悲哀,也是苏格拉底个人的悲哀。“苏格拉底之死,的确是一个悲剧,它体现了雅典的悲剧,也体现了整个希腊的悲剧,但不仅是哲学的悲剧、思想的悲剧,而首先是社会的、政治的悲剧。”<sup>[3](P44)</sup>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真正的原因是他与一般的雅典公民对城邦所表现的爱的差异上。一般雅典人维护的是城邦民主制的外在形式,而苏氏则维护的是城邦的内在根基。这一悲剧深刻地揭示了其哲学与雅典传统思想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客观精神(雅典的习俗、法律)与主观精神之间的严肃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苏格拉底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有意识地认识了并且说出了精神的更高的原则。这个更高的原则是有绝对的权利的。这个原则现在出现了,它表现得与精神意识的另一形态处在必然的关系中,这一种形态构成了雅典生活的实质,构成了苏格拉底所生活的世界的实质。希腊世界的原则还不能忍受主观反思的原则;因此主观反思的原则是以敌意的、破坏的姿态出现的。因此雅典人民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根据法律向它进行反击;他们把这个原则看成犯罪。这是整个世界史上英雄们的职责;通过这些英雄才涌现出新的世界。这个

新的原则是与以往的原则矛盾的,是以破坏性的姿态出现的;因此英雄们是以暴力强制的姿态出现的,是损坏法律的。”<sup>[4](P107)</sup>苏氏之死是使命和命运的悲剧,其意义在于:“在任何一种场合之下,较高的原则总显得具有破坏性,因为这个原则尚未与人民的实质合而为一。”<sup>[4](P48)</sup>

苏格拉底毕其一生讨论正义、正当等问题,并把它作为自始不渝的原则,他本来可以在法庭上作有利于自己的辩词来争得陪审团的同情,以此来减轻对他的惩罚,而且他的朋友们都为他准备好了减轻罪行的罚金,但他谢绝一切保释、逃跑等保全生命的策略。“我宁愿死于这种不利的辩护方式,而不愿为保命而采取其他辩护方式。”<sup>[5](P76)</sup>真正困难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避免做不义之事;不义之事比死亡更难逃避。当克里托劝说苏格拉底出逃时,苏格拉底说除非是正当理由,他不会选择出逃的。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和雅典法律之间有一种神圣的契约因而甘心选择了死刑:作为个人和有自由意志的雅典公民参与制定过雅典法律,雅典法律体现了他的意志自由和权利,因而他和雅典法律之间是一种神圣的契约关系,尊重法律就是尊重自己的意志和权利;反之,逃脱法律就是践踏自己的意志自由和权利。

当苏格拉底的朋友和门徒认识到他的定罪是对公义的讽刺时,他们开始努力营救苏格拉底。他的学生克里托为他提供逃跑的机会。大多数人肯定会欣然接受这个逃脱死刑的机会。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这样做。他说除非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否则他决不会逃跑。苏格拉底首先需要决定逃跑是否在道德上正当。“如果一个人一旦有了他的立场,无论他认为这种立场是最好的还是由于职责所在,那么我相信他必须面对危险,宁死勿辱,根本不会去考虑死亡或其他事情。”<sup>[2](P17)</sup>苏格拉底暗示,一生所遵行的道德论证告诉他逃跑是不对的。正如他所说的除非发现更好的论证,他才会逃跑。也正如我们所知的,苏格拉底选择不了逃跑,因为他没有发现更好的道德论证。

道德论证可以被当作一种推理,在这一推理下,人们可以作出自以为道德上正当的认为。道德论证是道德行为中所含的对道德原则和道德行为的认知与体验。在道德论证中,有两种不同成分:道德原则和认知行为或感知行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来行使的行为。比如“说谎是不对的”、“人应该过省察的生活”、“人应该做好事”等等。然而,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

行为中假定了道德原则。然而,在道德感知上的分歧要远远大于普遍的道德原则的认知。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明白苏格拉底与克里托的分歧之所在了。苏格拉底告诉克里托,他不能放弃一生所为的论证。苏格拉底指的是在这些论证中出现的普遍原则和他的“感知为”。他说除非克里托指出一种更好的途径,否则他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或自己感知事物的方式。“你知道,我决不从任何朋友那里随便接受意见,除非经过思考表明它是理性提供的最佳办法,这并非我的新想法,而是我的一贯做法。我不能仅仅因为现在的遭遇而放弃过去一直坚持的原则,它们在我看来依然如故,我现在依然好像从前那样敬重和对待这些原则。”<sup>[21] (P38)</sup> 苏格拉底选择不了逃跑,是因为克里托没能向他指出一条更好的途径。

为什么苏格拉底不自动设定克里托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并以此来获得逃跑的合法理由呢?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所过的是省察的生活。“不可一日不谈论善和其他各种主题,你们听到我和其他人谈论和考察这些事情,这确实是一个能做的最好的事,不经受这种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那么你们更加不会相信我。”<sup>[21] (P27)</sup> 也就是说,凭着省察对话者的同样方式,他省察了自己的道德观点。苏格拉底穷其一生地来确定自己道德信念的推论,消除任何引起其道德设定不一致的信念,改进自己对道德名称的概念。他的生活原则来自于无数次的诘问式所改进的概念。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感知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比克里托的感知更为正确。

苏格拉底告诉克里托,当决定住在雅典,并在此抚养子女时,苏格拉底就已承诺接受城邦所有的裁决,既然逃跑违背了城邦处死苏死刑的法律裁决,那么他逃跑就是不对的。更糟的是,如果背弃了对城邦的承诺,他也会对城邦造成伤害。“但若你用这种可耻的方式逃跑,以错还错,以恶报恶,践踏自己与我们订立的协议和合约,那么你伤害了你最不应该伤害的,包括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还有我们。到那时,你活着要面对我们的愤怒,你死后,我们的兄弟、冥府里的法律也不会热情欢迎你,因为他们知道你试图尽力摧毁我们。”<sup>[21] (P47)</sup> 于是,在对话结束时,苏格拉底要克里托放弃劝说其逃跑的努力。克里托也默认了苏格拉底的想法。苏格拉底说,在他被判处死刑后,神一直没有任何意见,可见神也是同意他死的。因此他不能违背神的意愿而甘愿选择死刑。“我非常明白我最好死

去,我摆脱心神烦乱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征兆来阻止我的原因。”<sup>[21] (P31)</sup> “你们也必须充满自信地看待死亡,并确立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任何事情都不能伤害一个好人,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诸神不会对他的命运无动于衷。呆板地说来,我的这种经验还没有到来。既然神指明了道路,就让我们遵循神的旨意行事吧。”<sup>[51] (P107)</sup> 苏格拉底和克里托得出这样的结论:苏格拉底应直面死亡,因为最好的道德论证支持这一点。这个事实说明,他们都相信理性和道德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因此,在一般人看来,道德原则来自外界,而且仅仅被习惯性地相信。因此,很多人以为,做有道德的人,不过是遵从习自他人的道德原则。但是,对于苏格拉底来说,道德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他看来,道德原则应该出自理性,出自反思和省察。

### 三

苏格拉底堪称是西方思想界中向死亡索取生命意义的典范。苏格拉底之死,祭起了理智主义的大旗。他为践行“德性即知识”原则而不懈努力并为之而受难,使得他的死本身就成为一次思想的盛典,一次意味无穷的哲学事件。苏格拉底从道德论证入手来寻求道德行为的正当理由,他发现只有出于理性的深思熟虑,才能确立人合乎行为的道德原则。也只有在这样的道德原则之下,个体的行为才会是正义的。这一过程本身彰显了哲学家对生命意义的努力扣问。苏氏之死,是其对死亡本身的哲学式体验。当生命完成了最后的意义时,肉体的存在对生命意义展开已经显得无足轻重,这也就是苏氏甘愿选择死刑的真正原因。“怕死只是不聪明而以为自己聪明、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的另一种形式。没有人知道死亡对人来说是否真的是一种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害怕死亡,就好像他们可以肯定死亡是最大的邪恶一样,这种无知,亦即不知道而以为知道,肯定是最应受到惩罚的无知。”<sup>[21] (P17)</sup> 苏氏之死,是一种摆脱肉体而实现灵魂超越的完美之举,他的死亡从一个维度折射出价值合理性优于普遍效用性的理想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苏格拉底的选择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存方式。

苏格拉底指出,“死亡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之一。它或者是一种毁灭,毫无知觉,或者如有人所说,死亡是一种真正的转变,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如果人死时毫无知觉,而只是进入无梦的睡眠,那么死亡真是一种奇妙的收获。如果死亡就是

这个样子,如果你们按这种方式看待死亡,那么我要再次说,死后的绵延岁月只不过是一夜而已。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就是灵魂从一处迁往另一处,如果我们听到的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如果所有死去的人都在那里,那么我们到那里还能找到比死亡更大的幸福呢,先生们?<sup>[21] (P30)</sup> 实际上,人终究是一个被死亡追逐着的怀疑的生物。人,除了死是不可逃脱的唯一绝对的在,一切此在都必须从走向死亡中获取生命的意义,并在一种超越的结构关系中获得自己作为人的人格存在性,正如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拉纳所说:“在整体上具有本质意义的是:作为精神的人认识到了绝对在,进而他作为精神面对着作为人格的绝对在,这个自由的、自身秉有主宰力的握着自我的人格。”<sup>[6] (P91)</sup>

在苏格拉底看来,他赋有神灵的使命,并且神一直告诉他要正确认识自己。他也一生自始不渝地遵循神谕,并为实行正义而谴责不义。这个神也就是理性。理性告诉他,除非找到正当的理由、否则,他选择逃跑就是对神意的违背。理性有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分,前者关注的是事实领域,后者是价值领域的话语。二者分别以知识(知性)和意志为其体现,然而它们以审美为中介统一于感性生命的个体之中。苏格拉底通过知性的理性来省察自己的生活,以自由意志的个体生命力来担当起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他的死是悲剧式的,同时也是崇高的。“他的遭遇并非只是他本人的个人浪漫遭遇,而是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它不过是借此事前,借苏格拉底而表现出来而已。这里有两种力量在互相对抗。一种力量是神圣的法律,是朴素的习俗,——与意志相一致的美德,宗教,——要求人们在其规律中自由地、高尚地、合乎伦理地生活;我们用抽象的方式可以把它称为客观的自由,伦理、宗教是人固有的本质,而另一方面这个本质又是自在自为的、真实的东西,而人是与本质一致的。与此相反,另一个原则同样是神圣法律,知识的法律(主观的自由),这是那令人识别善恶的知识之树上的果实,是来自自身的知识,也就是理性,——这是往后一切时代的哲学的普遍原则。”<sup>[41] (P44-45)</sup>

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耶稣的审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审判,像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一样,在西方人的想象力上留下一个这么生动的印象了,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鲜血,唤起了希伯来人乃至西方人对神灵的虔诚和对生命的敬畏,为西方人的生存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苏格拉底之死则体现了人类生存中的道德信仰——理性在人的生命中的存在意义。强调理性的 Logos 在人的伦理生活中的价值。这一希腊原创文化的 Logos 精神逻辑地蕴涵着知性和意志的两重因素,它本身就具有超历时之维和共时之维的先天品格。苏格拉底通过自己的悲剧使理性成了西方人生活的普遍原则。“他的哲学的实质和目的,就是把个人的个别行为化为一种有普遍意义的行为。”<sup>[4] (P48)</sup> 虽然理性在后来的发展中偏离苏氏意义上的本原精神,并且出现了科技理性的话语霸权以致打倒上帝并占据了其宝座,最终使自己难以摆脱被解构的现代命运。但是,如果我们将思维的视角切回到苏氏强调的理性那里去,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理性不是知性理性的线形发展,而是现代意义上的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良性互动机制,这种机制的根本动力和方向在于个体生命乃至人类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氏强调理性精神,一方面蕴涵着推动文明正值增长的基因,另一方面逻辑地体现了对理性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负值效应的价值引导。这种价值引导突出地表出在对现存社会的制度、文明成果的深情而又严厉的批判。通过这种反思批判,从而使人类的生活向着有秩序、有价值、有理想的文明方向发展,为人类生存营造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也就是苏格拉底之死的伦理价值之所在。

#### [参考文献]

- [1] 汪子嵩,等. 希腊哲学史: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2] (古希腊)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1卷[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3] 叶秀山. 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4] (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5] 余灵灵. 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集[M]. 上海:三联书店,1988.
- [6] (德)拉纳. 圣言的倾听者[M]. 朱雁冰,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4.

[责任编辑:舒生]